

總序

這一套《新橋譯叢》是在臺灣新光吳氏基金會獨力支持下進行編譯的。其範圍廣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幾個最重要的部門，包括哲學、思想史、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我細審本叢書的書目和編譯計劃，發現其中有三點特色，值得介紹給讀者：

第一、選擇的精審 這裏所選的書籍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術史上的經典作品，如韋伯(M. Weber, 1864—1920)和涂爾幹(E. Durkheim, 1858—1916)的社會學著作。經典著作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的；作者雖已是幾十年甚至百年以前的人物，但是他們所建立的典範和著作的豐富內涵仍然繼續在散發著光芒，對今天的讀者還有深刻的啓示作用。第二類是影響深遠，而且也在逐漸取得經典地位的當代著作，如紀爾茲(C. Geertz)的《文化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孔恩(T.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等。這些作品是注意今天西方思想和學術之發展動向的中國人所不能不讀的。第三類是深入淺出的綜合性著作，如帕森思(T. Parsons)的《社會演進》(*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契波拉(Carlo M. Cipolla)主編的《歐洲經濟史論叢》(*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這些書的作者都是本行中的傑出學人，他們鉤玄提要式的敘述則可以對讀者有指引的功用。

第二、編譯的慎重 各書的編譯都有一篇詳盡的導言，說明這部

書的價值和它在本行中的歷史脈絡，在必要的地方，譯者並加上註釋，使讀者可以不必依靠任何參考工具即能完整地瞭解全書的意義。

第三、譯者的出色當行 每一部專門著作都是由本行中受有嚴格訓練的學人翻譯的。所以譯者對原著的基本理解沒有偏差的危險，對專技名詞的中譯也能夠斟酌盡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譯者全是年輕一代的學人。這一事實充分地顯示了中國在吸收西方學術方面的新希望。

中國需要有系統地、全面地、深入地瞭解西方的人文學和社會科學，這個道理已毋需乎再有所申說了。瞭解之道必自信、達、雅的翻譯著手，這也早已是不證自明的真理了。民國以來，先後曾有不少次的大規模的譯書計劃，如商務印書館的編譯研究所、國立編譯館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都曾作過重要的貢獻。但是由於戰亂的緣故，往往不能照預定計劃進行。像本叢書這樣有眼光、有組織、有能力的翻譯計劃，是近數十年來所少見的。我十分佩服新光吳氏基金會的深心和魄力，也十分欣賞《新橋叢書》編輯委員會的熱忱和努力。我希望這套叢書的翻譯只是一個新的開始，從初編、二編、三編，不斷地繼續下去。持之以恆，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一定會從翻譯進入創造的階段。是為序。

余英時

1984年9月5日

目 錄

總序	余英時
導言	J.Revel/梁其姿譯..... 1
一、歐洲中世紀的“發明”	M.Bloch/康樂、洪德先譯..... 17
二、水碾的出現及其勝利	M.Bloch/康樂譯..... 35
三、巫術：無稽之談抑心態革命	L.Févre/羅久蓉譯..... 71
四、建構地中海的模式是否可能？	F.Braudel/王芝芝譯..... 85
I 農業、主要產業	88
II 工業資產負債表一則	97
III 散作制或 Verlag 制和都市工業的興起	102
IV 制度的繁榮	105
V 流動的勞動力	106
VI 通性和地方性的趨向	109
VII 商業交易的數量	114
VIII 長程貿易的意義和局限	119
IX 資本主義者的集中	123
X 地中海的船舶總噸數	125
XI 陸路運輸	128
XII 國家：這世紀最大的企業家	130
XIII 貴重金屬和貨幣經濟	134

XIV	五分之一的人是極貧困的?	136
XV	暫定的等級	142
XVI	糧食是不妥當的指標	145
XVII	我們的估計能查核嗎?	146
五、	農人	G.Duby/劉錚雲譯 149
I	人的因素	150
II	技術上的因素	155
III	土地的開墾	169
六、	1868年的入伍者：對於地域流動、犯罪劣行及體型與該年被徵召的法國青年及其他方面的相關研究	E.Le Roy Ladurie/古偉瀛譯 183
I	地域上的流動情形	194
II	體型	209
七、	中古時代教會的時間及商人的時間	J. Le Goff/梁其姿譯 215
八、	中古時期財富與死亡的關係	P. Ariès/梁其姿譯 239
	西中名詞對照表	261

導言

何威著

梁其姿譯

這本論文集所收的文章，可能讓初次翻閱本書的讀者感到驚訝。論文初次發表的日期所涵蓋的時間相當長，最早的在1930年代，最晚的在1970年代。表面上看來，它們所關切的問題也很分散：布洛克(Marc Bloch)處理的是技術史；杜比(G. Duby)與勒華拉杜里(E. Le Roy Ladurie)採取很不相同的角度來看社會史；布勞岱(E. Braudel)則探索地中海地區的經濟模式；最後，費夫爾(Lucien Febvre)、勒哥夫(Jacques Le Goff)與阿里鄂斯(Philippe Ariès)在相隔三十年的時間內，各用不同的方式來探索今天法國稱為“心態歷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的領域。那麼，在上述這些分異之外，把這七位作者與論文相連起來的，是什麼呢？那就是所有這些文章，雖然身份各異，但都屬於年鑑史學運動(La mouvance des Annales)，即發生在法國二十世紀的主要史學運動。

今天，這個運動已世界知名，並在最近二十多年來影響了大部份的西方史學。它的擴張甚至有時被認為是帶侵略性的，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在另一方面，它有時亦會引起強烈的抗拒，這種反應意味深長，其實也值得探討一下。不過，這種向外延展，從年鑑史學發展史中來看是很晚的，而且也引發起許多的誤會。1960-70年間發現年鑑史

學的人，往往忘記了他們剛認識的其實是一個已有相當歷史的集體研究運動；而且，在目標上及研究領域方面，已經歷過數次算得上重大的修改：今天所謂的“新歷史”——有時人們錯誤地把整個年鑑史學化約於此——其實根植於本世紀前期的思想發展，下文將提到此點。第二個誤會是，有些人往往給予年鑑史學運動一種一致性、嚴密性、尤其一種同質性。在我看來，這些特性大部份是後來被構想出來的。如果把年鑑史學稱為“學派”，那麼這個“學派”所隱含的意義，應該是一種思想上的敏感性(sensibilité)以及職業上的團結。這兩點在我看來，遠比後來被附會於年鑑史學之上的理論統一，實在明顯得多。上述的兩個誤會，如果沒有帶來誤解和闡釋上的謬誤，便無關痛癢。但是它們往往掩蔽了這個運動真正的豐盛之處：多樣性、開放性和包涵性。

《年鑑學報》原為史特拉斯堡大學(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兩位教授：布洛克與費夫爾在1929年創辦的學報，全名是《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學報》(*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後來易名為《(年鑑)學報：經濟、社會、文明》(*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近四十年來，此名較為人所熟悉。一開始，這份學報即以反對學院派的史學正統(establishment)為己任。這並不是因為布洛克與費夫爾是學術界的邊緣份子，他們兩人都是成熟的學者，在學院之等級制度裏地位鞏固，他們豐富的著作在他們的職業圈子中是得到承認的。他們之所以走反對路線，是由於他們對歷史的另一種概念與當時文學院所普遍接受的大相逕庭。這個新概念是基於兩個牢固的信念之上。今天看來，這些信念已屬老生常談，而且早已成為絕大多數史學家所遵守的宗旨，但在《年鑑學報》創立的當時，情形

絕非如是。

第一個信念，就是認為所有的歷史基本上是社會史，任務在於分析人為的事實及在這些事實之間的關係。所反對的是把歷史意義簡化為大人物、大事件的描述及政治與戰爭事件的按時序排列。目的在於找出過去生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即歷史的“血和肉”。於此，再沒有所謂的大題目、小題目之分，有的是錯綜複雜的多種真相，促成了處理社會總體的多種方法：我們必須細心觀察這眾多的真相，把它們逐一澄清、比較、納入某種秩序以求找出一些穩定的關係，這些關係可構成系統。從這個角度看，獨立的歷史事件沒有任何意義。如果一個事件在它的軼事性質之外，驗證了一些規律性，而這些規律性有一天會容許我們建立某種法則，這樣，這件事才具意義。

本文集的作者的第二個信念是從第一個信念衍生出來的。如果社會這個層次是一個整體，那麼所有研究它的科學方法便應該相互驗證各自的研究步驟及結果，而不是孤立在自己狹隘的框框裏。布洛克與費夫爾一開始即極力提倡結合表面上看來分歧的經驗：即史學家、地理學家、社會學家、民族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語言學家的經驗。他們絕對要透過多種學科的角度來看社會。事實上，《年鑑學報》初期的撰稿人就不純粹是學術界的史學家，當時學報即致力於以集體研究計畫來結合不同性質的專家的興趣與專長。而由於這個結合多種學科的方向，產生了後來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構想和實現。自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這所學院即在制度上實行了當年年鑑史學的綱領。

在這裏應該一提的，就是1929年布洛克與費夫爾創辦《年鑑學報》時，他們的綱領並非絕對創新。而遠在此以前已生根。例如當時非

常優秀的法國地理學派，在領導人維大爾德拉巴拉殊(Paul Vidal de la Blache)的帶領之下，提出了在區域研究方面幾個直至今天仍非常著名的報告。這種在固定空間內，以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處理人文現象的初步嘗試，大大地影響了後來年鑑學派的研究興趣和敏感性。此外，最主要的，乃是涂爾幹(Durkheim)的社會學，這個社會學派在方法上的嚴格要求及在學術上的戰鬥精神——誠如在1898年創刊的《社會學年報》(*Année Sociologique*)所表現的——均成為布洛克與費夫爾兩位史學家的模範。不過，這些努力雖然在法國學界廿世紀初的昏沈氣氛中，極為突出，但始終沒有成功地樹立長久的聲望，只有脆弱的少數團體活躍其中。除了吸收並修正了這些科學綱領之外，布洛克與費夫爾真正成功之處，在於在史學的周圍組織了一個社會科學系統，或以今天愈來愈多的人的用語來說，一個人文科學系統。這個系統圍繞着中心的學科——史學，這個被承認的、正統的、在當時學院組織中穩據重要地位的學科。

《年鑑學報》的創立與今天相隔了大半個世紀。在這段時間內，我們不但看到當年的提綱的延續，而且還有它的不斷重整。它的定義相當廣泛，因此可容納各種的學術性創見，甚至有時是相互矛盾的創見。不過，特別重要的是，在這段漫長的日子裏，這個以融會不同社會科學的各種成就為主的綱領，也免不了經歷了個別社會科學本身在加速轉化期中的演化——我們只要回想一下在六〇年代結構主義攻勢之猛烈！雖然本文集在成千上萬篇可反映出年鑑史學自1929年開始的歷程的論文中，只選了八篇，它們却足以同時說明了兩件事：年鑑史學的一些主題，及鑽研歷史的一些方式，我認為這些在這個集體運動中是很重要的。

布洛克這位大概是本世紀最有原創性的法國史學家，他的兩篇文章把中古——這段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停滯時期——的技術發明這段隱晦的歷史，寫出了新的意義。一直到布洛克的時代，只有業餘的史學家才會注意這個普遍被認為是細枝末節的歷史。布洛克的首要功勞，在於顯示出在某個特定的時間內，技術發明如何反映出社會狀況、及在社會中的各種糾纏的關係。因為技術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牽涉到經濟需求、權力關係、對勞動的觀念及勞動的社會組織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單說明了為什麼某個發明會出現，而且還解釋了它為何被接受，或相反地被抗拒排斥。這是從一個個別的研究對象出發，進而在這個對象周圍重建了一個社會系統，而原來的研究對象就在這系統中呈現它的歷史意義。

而布勞岱的論文則屬於另一種既相似但又非常不同的工作。所以說相似，是因為《腓利浦二世時代之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1949)此一鉅著的作者，大概是朝結合各學科的方向走得最遠的一位。不過此書的研究對象是屬宏觀性(*macroscopique*)的：空間擴大至一個洲的大小，時間上涵蓋了整個十六世紀，而且所掌握的是有關這個世界的所有問題及幾個不同的時段。在本文集中翻譯出來的這一章中，可看出經濟問題的極重大影響力。經濟問題在一九三〇年代至六〇年代間在年鑑史學的發展史中佔着關鍵性的位置。研究量化指數，重建價格、工資、生產、貿易方面的級數(*séries*)、經濟模式等等方面的探討，在近二十多年來，由於經濟計量學的貢獻而經歷過深刻的革新。當時的歷史概念，是認為研究對象的構思與論據之建立必須科學化，而量化研究會一度是這個概念的主要表現方式之一。

而杜比和勒華拉杜里這兩位屬年鑑史學第三代的史學家，在本文

集中所撰的論文，是社會史研究的理想的兩個重要例子。他們立心為大多數藉藉無聞的群眾、傳統上被歷史的“大雅之堂”所忽略的群眾，撰寫屬於他們的歷史。中古前期的農民與十九世紀的法國平民，都是在歷史舞台上一直沒有表達機會的演員；然而他們的數目、勞動、感情——如果我們把這些弄清楚——却是構成歷史深層的因素。這類追溯以往的社會學可有很不同的形式：布洛克的名副其實的繼承人杜比，在重新界定的、涵蓋數世紀的時段中，透過生產與權力關係來分析歷史；而勒華拉杜里則利用大量的統計資料，探索體質人類學這條才剛開關的途徑。

費夫爾、勒哥夫與阿里鄂斯的論文，則以各自的形式，來探討年鑑史學的另一蹊徑：心態歷史。在構成人的歷史經驗的工具系統及價值系統中，“心態歷史”重新處理文化產品——文化一詞在這裏應用人類學的概念來了解，並非囿於其傳統的標準定義。在這方面，心態歷史與觀念史、思想家及其著作的歷史，有明顯的對比。布洛克以《神醫皇帝》(*Les Rois thaumaturges*, 1924)一書，費夫爾以幾部重要的傳記：路德(Luther, 1929)、拉伯雷(Rabelais, 1942)、瑪嘉列特·德·納瓦爾(Marguerite de Navarre, 1944)及無數的文章來闡出這條途徑。這途徑大概就是六〇年代以來，最能表達年鑑學派運動的活力的；它一直不斷增加研究的對象、方式步驟，直至今提出一個探討群體行為與表象(représentations)的歷史人類學的藍圖。而上述那個謹慎的、經過嚴謹反省的、認真的科際整合綱領，透過此一途徑，實現最圓滿的成就。

讀者可能覺得本文集的論文內容過於分散。不過，如果他確認為

年鑑史學有意義，他自會進一步地追溯下去，為自己找出這個集體研究運動的頭緒；畢竟我們只能在上文簡單地提出幾個共同點。另一方面，就至今仍為年鑑學派建造其一貫性、統一性的因素而言，(就算這學派的史學成就已廣泛地向世界顯示了它的選擇和成果)，這八篇文章亦足以讓讀者領會其要旨：絕對以群體現象為主，以複雜性為要，並同時採用幾個解釋系統；在令人眼花繚亂的事實之前，在支離破碎的真實之後，仍有雄心壯志去找尋在這個緩慢的歷史中改變我們的社會的大規模演化；創造歷史的人，或自命創造歷史的人，根本無法覺察到這個歷史的緩慢步伐，即布勞岱名之為“緩慢的長時期”(longue durée)的歷史。

※傑克·何威(Jacques Revel), 1942年生, 巴黎高等師範學院畢業。曾任《年鑑學報》編輯委員, 現任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其專長為十六至十八世紀之西歐社會史及文化史。其代表作有《語言的政策: 法國革命與方言》(1975), 《十六至十八世紀歐洲大學生之社會史》(1986, 1989)。